

大跃进一二线领导言论梳理（修订稿）

基本背景：

在1956年的“八大”召开之前，毛泽东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过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问题。1956年在北戴河召开的一次有几十人参加的中央高层会议上，大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讨论。讨论的结果是：对毛泽东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的要求，“大家认为可行”。对毛泽东辞去党中央主席的要求，“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八大”之后，毛泽东退居二线，刘少奇、邓小平实际上开始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当时中央的基本领导格局是：政治局会议主要由刘少奇主持，书记处会议主要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则由周恩来主持。

史料梳理：

毛泽东言论和决策用**红色**标出，其他领导人言论和决策用**蓝色**标出

一九五八年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央在南宁市召开了一次国务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提出向苏联学习搞集体食堂，毛主席不主张，只同意搞一个试点。**（甄石：《大跃进五十周年回忆录》，下称甄石《回忆录》）

三月，**邓的八大二次会议报告草稿：用平衡论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就不可能设想用十年的时间赶上英国，用二十五年的时间赶上美国。毛改十五年赶英，二十五年后加“更多一点”。**

同月，**毛泽东：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

同月，**成都会议：毛泽东：一年内实现四化，‘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份紧张’。**

同月同会，**刘让朱德就公共食堂问题向主席“吹吹风，使这项工作能够尽快在全国展开”**（甄石《回忆录》）

同月同会（三月二十日）：**毛泽东讲话：**

只要总路线正确，是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调动一切积极力量，那么，先后一年，二年，乃至三年，五年完成四十条，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

毛在听取辽宁的汇报时，批评他们提出两年实现亩产四百斤是“吹得太大”。他说：“不要吹得太大，还是五年计划争取三年完成”，留有余地，以免被动。

同月同会（三月二十五日）：做是一件事，讲又是一件事。即使能做得到，讲也要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给下级留点余地，也就是替自己留点余地。总而言之，支票开得太多，后头难于兑现。“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

据吴冷西的回忆：毛主席还说：“此事关系重大，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再谈谈。”

同月同会：吴芝圃向毛主席汇报河南能搞几百亿斤粮食，河南粮食很快就过关了，主席根本不信，给他顶了回去。毛主席说：“试试看，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

同月同会，毛泽东对吴芝圃：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一年实现四化，不惟不可能，即使实现了，其后果也不堪设想」。

同月（一说四月）：毛泽东：吴芝圃讲搞 300 亿方，我看得死 3 万人。曾希圣讲搞 200 亿方，我看得死 2 万人。他们那是虚夸。渭清讲 3 亿方，可以一个人不死。

四月，刘少奇一行从北京赴广州，途中在火车上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闲聊。从半工半读，普及教育，扯到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进而提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在这里第一次出现。

四月一日，毛问吴芝圃：“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消灭四害，但还是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四月二日，毛主席在武汉会议上再一次指出“要留有余地”。他说：“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

四月三日，毛泽东听取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汇报时又说：“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并严肃指出：“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四月五日，毛泽东主持武汉会议听取湖南汇报指出，吹牛不算，要看结果。他说：“现在劲头很大，不要秋天泄了气。要搞具体措施，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四月九日，毛泽东听取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汇报，严肃批评了造假现象：“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要好好检查，核对清楚，有的是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四月十一日上午，毛泽东找吴冷西和田家英再次就《人民日报》宣传问题，谈了以下几点意见：“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2、现有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但是报纸在宣传上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越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3、报纸的宣传要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水平，能对眼前五彩缤纷的现象作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介绍一个合作社》）

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十五年超过英国口号几年内不要变（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四月底，毛泽东同刘、周、陆定一、邓力群等人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

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看来刘、朱关于公共食堂的“吹风”管用，同时也与主席的公共食堂的一贯态度有关。但注意这里是远景构想）然后刘少奇第一时间把这个远景构想透露给吴芝圃，让他现在搞公社试点。

四月，刘少奇在开往广州的火车上向周恩来、陆定一说：“我向主席提出来办集体食堂的事，主席同意先搞试点，你们出个主意，试点放在哪里最合适？”陆定一说：“南方放一个、北方放一个，有代表性。”刘少奇说：“不，我准备南、北、中各放一个。北方的放在天津、中间的放在河南，我已向这两个地方的干部打了招呼。南方么，见了陶铸再定好了。”（甄石《回忆录》）

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李富春：七年超英，十五年赶美（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同意（《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原因：王鹤寿三月的两个报告对我国和英国的情况作了详细分析，认为赶超时间可以缩短（四月二日毛泽东同波兰代表团谈话，预计赶超时间已有所缩短））

注意：此时七年构想并未向下传达或对外宣传，五月二十三日《八大二次会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争取在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期内，在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积极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积极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将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大大地发展起来，将要大大地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使我国工业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期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八大二次会议报告稿曾经毛审阅修改。

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毛主席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在十二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我国不同的地区分别达到400斤、500斤和800斤。（后习称“四五八”、“跨黄河，过长江”）

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讲了半工半读与生活集体化，并要北京和天津先搞试验。

八大二次会议开始前隙，刘少奇找到毛泽东说：“主席，向你汇报个好消息，集体食堂试点搞成功了。我亲自到天津、河南两个试点进行了调查，当地的干部、群众都说好。”毛泽东说：“会有人说好的。但，要把都字去掉。家庭条件差的会说好，家庭条件好的就不一定是真心话喽。”刘少奇：“主席，我讲的全是实话，没有半点谎言。”毛泽东摇摇手说：“世上没有完美的事情和物，人也不例外。吃大锅饭，有人说甜、有人说咸，众口难调么。”刘少奇：“主席说得对。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我建议尽快向全国推广。”毛泽东：“不要急于求成。向全国推广是个大问题，要考虑、要坐下来研究，试点范围可以在大一点，效果究竟怎么样？那时再说好了。”“试点范围可以再大一点”的“大”字，让刘少奇得到了尚方宝剑。他在全中国到处乱跑，到处乱说：“主席同意了他大办集体食堂的建议。”并向多人吹嘘集体食堂是他的杰作。在此期间，刘少奇没有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同意，督促很多地方合了大伙，建立了集体食堂，吃了大锅饭。等到中央形成了意见，他已经生米做成了熟饭。（甄石《回忆录》）

六月初，毛泽东与谭震林、赵尔陆、王鹤寿多次谈话，都没留记录，但个人认为值得注意。

六月初，刘少奇到西花厅同周恩来谈话时说：“……搞大跃进就象吹气球一样，气吹足了气球就飞起来了。把全国的老百姓都吹起来了，大跃进就更加轰轰烈烈了。国务院的工作离不开你，我到全国各地替你去吹好了。”（甄石《回忆录》）

六月七日：毛泽东：钢今年要翻一番，搞到一千万吨，后年可到三千万吨。（同驻外大使谈话）

同日：毛泽东批王鹤寿报告：一九六二年，可产六千万吨钢。六日，王鹤寿报告：我们找林铁商谈了华北区的钢铁建设问题，他们原来的计划较小，商谈结果，认为争取明年底达到生产能力 800 万吨是可能的，我们两方面都有信心争取完成这个指标。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放出卫星，今年有五亩小麦每亩平均实产两千一百零五斤。

六月九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又报道：湖北省襄阳专区小麦大面积丰产亩产 1500—2000 斤成为普遍现象；湖北省谷城县乐民社一点一亩小麦试验地，亩产达到二千三百五十七斤。

六月十一、十二、十六、十八、二十一、二十三日，人民日报都在在第一版分别报道了河北魏县、河南省遂平县、湖北省谷城县、河南省商丘县、辉县、湖北省谷城县的高产纪录。

六月十四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谈话，把托儿所、公共食堂等这样一些生活服务组织视为“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刘少奇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六月十六日，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二五”计划要点，提出第二个五年的任务是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十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这个报告使毛泽东“大开眼界”。

六月十七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报告，汇报了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

六月十八日：毛泽东提出一九五八年 1100 万吨钢

六月二十一日：军委扩大会议：三年超英，十年超美

同日，冶金部党组：从各大协作区会议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 3000 万吨，而 1962 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毛批发。

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同意薄一波十七日的报告。毛泽东将这个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 1959 年达到 2500 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六月二十四日：邓子恢：按夏收推算，全年粮食总产可突破 5200 亿斤，增产可达 2100 亿斤。这样，今年即可超过八大规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粮食产量指标。

同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道：湖北省孝感县长风农业社，正在力争创造今年稻谷亩产万斤的高额丰产纪录。王任重：既然小麦能够亩产四千多斤，为什么稻谷不能够亩产万斤呢？事情总是这样：想得到就能做得到。

六月二十五日：谭震林：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四年五年完成，今年一年就完成了，并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全国的粮食产量，估计可能达到五千亿斤以上。

六月三十日：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编辑人员谈话：三、四十年进共产主义

同日，刘少奇：驯服工具论。“只要跟着党走，就能当将军，当部长，在将来写历史的时候，写上你一个名字。”

同日，人民日报第一版报道：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创小麦亩产五千一百零三斤的全国最高纪录。这一数字是一九五四年冬小麦世界纪录的 3.4 倍。

（“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 6 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把宣传口关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关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 1958 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 1958 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第 72 页，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

七月三日：毛主席《介绍一封信》：“早造（早稻）每亩能收 300 斤已经很好，比去年的 200 斤增长 50%，何况还有 350-400 斤的希望。原先的 800 斤指标是高了，肥料和深耕两个条件跟不上去。”（早稻产量高于冬小麦）
写完后毛要求在《红旗》发表赵紫阳的信。

七月五日：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讲出了两年超英的构想，更加码提出十五年超过整个欧洲，单省超一国，河北要超英，河南要超法，再一个超意，再一个超西德…

七月七日：周总理响应主席文章。“（周）回到广州后，立刻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要求他们在报粮食产量时一定要避免虚假，保证社员的口粮，不要损害群众的利益。”

七月十二日：刘少奇继续给浮夸风撑腰。在天津赴济南的列车上和江西省都昌县赴京团开

座谈会，西田乡党总支书记占开章：“我乡有个水稻丰产模范社，1957年平均亩产一千多斤，最高的达二千多斤。”刘少奇：“那很不错呀！”又继续问：“粮食增产有没有个顶——有没有个限度呀？”众：“增产永远也不能到顶，我们要一跃再跃，三年之内我们要搞双千斤县，还要搞万斤亩，更高的……”刘少奇：“对，就要这样干，今年跃进，明年再来一个大跃进，后年还要大跃进，只要不断地跃进，我们赶英国就快了，这样我们中国变样子就快得很呀！你们说对不对？”

同日编印的《内部参考》刊登了湖北省写的《农业社办食堂对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有很大促进作用》一文。该文说：办食堂对促进生产、改善生活有四大好处：节省了劳动力，扩大了社员收入；节约了粮食；节约了燃料，减少了社员开支；有利于发展生猪生产。毛泽东看后十分重视，立即批示“在《红旗》上发表。”（事实上，湖北省的京山县，早在1955年就有当时的互助组办起过农忙食堂。那年4月大农忙的时候，该互助组只有13个劳动力却要耕种110亩田地，人手不够，有人提议，要是集体吃饭，就能出工整齐，可以多干活。这一提议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于是，借了一位社员的一间房子，集资买了一口锅，其他社员凑了一些刀、筷、碗、瓢，办起了食堂。这个食堂办了两季，夏收一季，秋收一季，农忙过后，还是回各家起火。湖北省其他一些县乡，如荆门县的东平乡、马平乡等，都有从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就办起并一直坚持下来的食堂，从合伙做饭到农忙食堂，也有的由农忙食堂变成常年食堂。据1958年7月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随着农业集体生产的发展，湖南邵阳、桃源县，湖北公安县和福建安溪县等地的农业社，也都出现了公共食堂。这些食堂都是根据社员自愿参加的原则，受到了群众的欢迎。有的食堂在群众自己的管理下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规章制度。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多次讲：“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公共食堂在公社化之前就有了。”诚然，毛泽东本人对公共食堂确实情有独钟。在他这段时期赞许食堂和托儿所的许多言论中，主要讲的“是妇女的解放和下一代的培养”。“毛泽东对于食堂和托儿所的热烈欢迎，绝不仅仅着眼于劳动力的释放，而是从历史发展的潮流，从落后的小农经济向工业化进步的必然过程来看问题的。他的视野要宽广远大得多。”“然而，现实并没有像毛泽东希望的那么美好。当一件群众为了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自愿去做的事情，变成了官员为了创造官场政绩而强制推行的行政行为，它就变了味，使得本来旨在解放群众促进生产力的举措“异化”为束缚群众阻碍生产力的枷锁。这真是历史的悲剧。”（林之辛《食堂到底好不好，毛泽东为何纠结？》（知乎））

七月十二日至三十一日，人日继续高强度刮浮夸风。

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寿张对当地的浮夸风，亩产几万斤，大加赞赏，认为是“打倒了科学家”，“是一个革命”。并要求当地政府拨出几百亩地，办一个学校，学生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用这个办法，不要很久，全国人民都能上大学。这次讲话由《光明日报》报道。

七月十五日，陶铸文章：广东“被认为是最落后的许多地区，今年（早稻）不是一下就超过四百斤了吗？早稻产量超过一千斤的，也已经是成千上万亩了。”“高产作物的水稻，在广东一年可以种三造，达到亩产一万斤也应当是可能的。”广东早稻“已有亩产两千斤的，今年晚稻一定会有更高的产量出现”，“全年水稻亩产量即可提高到七千至八千斤，加上冬种粮食作物，全年即可达到一万斤。”“所有这些，清楚地说明了‘粮食增产有限论’者对自然地认识是极为贫乏，他们的论断才是主观主义的。”相当于直接批驳毛。

七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刘少奇到石景山钢铁厂和石景山发电厂视察，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说：“哪里有什么全民”；“企业自治”；“你们不要怕跟南斯拉夫一样”；“我主张你们搞成了托拉斯”；“什么时候你们的企业好像‘独立王国’，自给自足，就变成共产主义了。”并且又一次把两三年超英的话捅了出去。

七月十六日、八月一日出版两期《红旗》杂志，陈伯达均未应毛的要求发表赵紫阳的信。七月十六日《红旗》发表于光远文章：“据河南安徽江苏陕西山东五省不完全统计，亩产千斤以上的小麦试验田就有二十万亩，其中有许多亩产三千斤、四千斤、五千斤以上的高产纪录。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有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小麦试验田亩产高达七千三百三十斤的记录。根据一九五四年苏联卢克亚钮克所著的《如何获得冬小麦的高额丰产》记载，当时冬小麦世界纪录是每公顷一百一十八公担，即每亩一千四百九十一斤。我国农民在今年夏天所创造的最高纪录已为这个数字的百分之四百九十。”

七月十九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前述陶铸文章。

八月四日，毛泽东亲自到徐水视察。请完整地、认真地看完下面全部文字：

主席在进门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这个乡的党委书记詹登科，社里的支书阎玉如和社主任李江生；现在，又让写了写他们的名字，并把每个名字都念了一遍。接着就抬起头来问他们：“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很好！比哪一年都强。”李江生回答。毛主席又问：“每亩平均多少斤？”支书阎玉如答道：“七百五十四斤！”毛主席笑着“啊”了一声，赞叹地说道：“不少呀！”随后又问大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的，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主席说，今年全县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下十二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两千斤。张国忠又说，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夏山药三十五万亩。毛主席听了以后不觉睁大了眼睛，笑嘻嘻地看了看屋里的人，说道：“要收那么多粮食呀！”这时候，毛主席显然是想起了张国忠在路上介绍的本县情况，就伸出又厚又大的坚强的巴掌，算账一般地说：“你们夏收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呢！秋收十一亿斤呀！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大家一时被毛主席问住了。后来，张国忠答道：“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毛主席说：“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都想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李江生说：“我们拿山药造酒精。”毛主席说：“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那么多酒精啊！”毛主席呵呵笑着，左右环顾地看看大家。大家不觉都跟着笑了起来。张国忠也笑道：“我们只是光考虑怎么多打粮食。”毛主席说：“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呢！”很多人都在私下里互相小声地说着：“毛主席看问题看得多远，看得多周到啊！”“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毛主席又笑道：“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主席听到那些山药都是亩产二十五万斤，有的计划为亩产一百万斤，不禁又笑问道：“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又对乡、社干部说：“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闹文化娱乐，办大中小学，你们看好么？”大家都说好，都听得高兴。有人告诉主席，说这个社已经办起了共产主义红专大学；主席惊喜地“啊”了一声，笑着直点头……毛主席到了县委会，头一句话就同省委解书记和张副省长说：“这里

的干劲不小哩！”又对大家说：“世界上的事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在反毛右派眼里，这段话简直是“毛泽东鼓吹浮夸”的铁证和“法宝”。《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绳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自己的书里摘引了这篇报道，借以证明浮夸风的始作俑者是毛泽东。但是，为了让史料为自己的错误论点服务，杨继绳删去了两句重要的话：①毛泽东听到阎玉如汇报754斤亩产后就赞叹“**不少啊**”，试问他怎么可能相信张国忠的“**全县平均亩产两千斤**”？杨继绳深知这句话对自己所支持的论点具有毁灭性打击作用，于是就把它删掉了。②毛泽东那句“**一天吃五顿也行嘛！**”并不是反毛右派鼓噪的“浮夸铁证”。对这句话的误解，是那些人云亦云，不读书、不看报、不思考，或者只看资产阶级的书报文章的右派分子根本不了解毛泽东那幽默洒脱、亦庄亦谐的语言风格造成的。正如鹤龄同志指出的那样：“只要不是智障白痴，谁都会明白，**这是一句十分明显的逗趣的玩笑话！**因为，只要不是傻瓜，谁都知道，人的食量有限，一日饱食三餐即可满足生理的正常需要，不会随着用餐次数的增多而无限的增加食量。”所以，杨继绳“敏感地觉察到了这八个字的‘反作用’”，毫不犹豫地将它删去。但是，“即使杨继绳弃去了上面的情节，作为一个智力正常且心态正常的人，依然可以从杨继绳摘引的康濯文中看出，**毛主席是用笑语讥讽浮夸风。**”文中，张国忠说“夏收九千多万斤，秋收十一亿斤”，一季之隔的十几倍粮食产量增长从哪里来呢？这是任何一个想到要算且能算出这笔账的人心里必定要产生的问号！但是，毛主席没有向张国忠直截了当的提出这个问号，而是**转了个弯子装起糊涂来**，提出了“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的问号，并“认认真真”地和群众讨论怎样破解这个问号，又在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讨论中最后出了一个“**可以吃五顿**”的“**妙招**”破解了这个问号！仔细揣摩毛泽东在县委会说的“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这句话，也不难觉察到毛泽东暗含的揶揄讥讽之意。正如鹤龄同志所言：“毛主席到徐水，是来调查了解基层情况的。要是他板着面孔当场批评大家弄虚作假搞浮夸，浮夸风的真实情况还能在他的面前表露出来吗？”事实上，“**一天吃五顿**”和“**吴芝圃，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我……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对犯“左”倾错误的干部说的“**你们各地方没有手伸得太长，没有引起农民的抵抗那你们非常正确，完全马克思**”，以及那句被反毛分子讥讽了十余年的“**感谢日本‘皇军’**”实际上都是一个道理，都属于毛泽东为了“**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或者表达自己对事物的辩证看法而显露出的他独有的“毛式幽默”语言风格。须知，毛泽东早在一九二九年为红四军干部制定《教授法》时，就在第六条里规定：“**说话要有趣味。**”至于那些坚持“左”倾错误的领导干部不明白毛泽东的良苦用心，这只能说是历史的巨大遗憾，而绝没有以此苛责毛泽东的理由。上引鹤龄同志的话，皆见《鹤龄：毛主席真认为徐水粮食吃不完吗——百问杨继绳之27》。）

八月六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赵云山、赵本荣《徐水共产主义试点始末》《党史通讯》1987年第六期）。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

的红旗，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几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康濯：《徐水人民公社颂》1958年9月1日《人民日报》）

八月八日，王任重同刘少奇谈话时说：“天津一个村干部汇报，他们村有块稻田预计亩产超万斤。“刘听后说：“一万斤是不是少了点，能不能搞它个三万斤、五万斤？这样可以更好的鼓励全国人民大跃进的积极性么。”

八月十一日，谭震林文章：“夏季丰收证明，我国粮食增产速度不仅可以是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几十，而且可以是成倍地增长。夏季丰收，大面积的成倍的增产，特别是亩产六、七千斤的小麦‘卫星’上天，把过去许多陈腐的观点打破了。过去人们认为，小麦是低产作物，现在证明不对了。小麦既然能够由低产变为高产，其他作物为什么不能高产呢？”人日第一版发表。

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毛表示不相信，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们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再次要求陈发表赵紫阳的信。八月十六日，该信在《红旗》发表，但也应毛的要求发表了下述谭震林6月25日的文章《争取在两三年内做到丰衣足食》。

谭震林的文章说：“今年早稻看起来大面积的丰收会出现，千斤亩，千斤县都可能出现。安徽的春稻，我看千斤亩不少，其中五千斤、六千斤、七千斤、八千斤亩也会出现的。”

八月十七日—八月三十日，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一九五八年1070万吨钢，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

（确定过程：

八月十七日，毛泽东讲话：“钢由五七年的530万吨翻一番，达到1100万吨，有完不成的危险，中心问题是搞铁。现在都打了电话，发动了，可是还要抓紧些，要回电话，要保证。”

会议后期，毛泽东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工业部负责人找到小会议室一起开会。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刘彬和办公厅主任袁宝华和各钢铁大省市许多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个小会。

袁宝华回忆：

当年完成1070万吨钢，冶金部的部长王鹤寿向毛主席拍了胸脯，他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把钢铁搞上去，后来王鹤寿专门检讨了这一条。

毛主席又把几个省市的负责人和冶金部负责人找在一起开会，王鹤寿、刘彬和我都参加了当时刘彬是冶金部副部长，我是办公厅主任主要管建设和计划。毛主席找我们这些人在他的会议室里详细地询问了1070到底可靠不可靠，一个人一个人地问。

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

接着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已去世）行不行，说可以。

又问武汉市委书记，也说行。

还问了太原市委书记（他那里有个太钢）。太原市委书记姓麻，问行不行，说可以。毛主席开玩笑说，你姓麻，隋朝大将有个麻叔谋，与你有什么关系？

后来又一个一个地问主要钢铁基地包括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大家都说行。

问到刘彬，毛主席说，你这个模样我好像见到过，刘彬说，我是刘英的弟弟（刘英是张闻天的夫人）。毛主席说“怪不得眼熟，你管什么？”刘彬说“我管生产，我是冶金部副部长。”主席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作了计算啦。”我当时心里打鼓，估计会问到自己，得作些准备。

后来问到我，说“你做什么呢？”我说我先在东北工业部，后来去苏联谈判，回来在钢铁局。毛主席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我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十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先进单位）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别人讲得简单，只是拍拍胸脯，我讲了十面红旗，毛主席很注意听十面红旗是什么。

问到王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当时是八月，到年底只有五个月时间。最后问到薄一波同志，他比较实事求是的，他不赞成1070，可是又不好说不赞成。他讲了什么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1070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毛主席说，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1070，是1100多万吨，发表1070（上年是535，翻一番是1070），那我们兜里还装有几十万吨。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这是他一贯的主张。当时他要秘书马上通知胡乔木，明天见报。

这一次谈的时间不短，总有两个钟头。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有些不放心的，所以专门开了这个会，结果大家都说行，而且报的数字超过1070，所以毛主席相信了，并在报纸上发表了。他对陈云说，1070看来还是可以的。陈云不放心，专门找王鹤寿和我去谈了一次。

“究竟怎么样，你们算个细帐给我，毛主席那里不能算细帐，在我这里你们算个细帐。”我就把当时他要求的数字，现有的基础能生产多少，新建小高炉有多少，能生产多少，生产能力都打了折扣；原来炼钢设备能生产多少，新建小转炉能生产多少，这也是按公称能力打了折扣算的，今后五个月我按四个月算。这样算了细帐，陈云认为，看起来是有希望的。后来毛主席与陈云同志谈话时，陈云说，我与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细帐，看起来是有希望的。陈云同志说话向来是很慎重的。

这一次毛主席的谈话给我的深刻印象是，他对于重大问题抓得很细，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在场的一个人不落。实际上汇报假情况的责任在我们，分明不行，却拍着胸脯硬说行，后来总理在批评这几个部长时就讲这一条。）

（周总理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一日反思：

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去年的1070万吨钢，本来主席是提出来问的，我们没有经过多少调查研究，全党就行动起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协作区主任讲话：要图快，武钢可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各级只能办自己能办的事情。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

在浮夸风的影响下，北戴河工作会议对我国1958年的粮食产量做了错误的估计。这次会议发表的新闻稿说：这次“会议指出，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六千亿斤至七千亿斤，比1957年增产60%至90%，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一千斤左右”。（据《还清白于毛泽东》，会议期间，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于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在北戴河会议上的几次讲话中，毛泽东接受了许多一线领导人的错误观点，认为：“人多

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如果做到吃饭不要钱，这是一个变化，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但同时也指出：“关于人民公社，我的意见就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的办法，可以逐步实行，暂时不定，一九五九年是否实行，明年再看。资产阶级法权不能完全废除……”

八月二十五日：工业书记会议上，陈云提出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命运还有一个时期。（大炼钢铁开始虽然造成了浪费，很多方法不当，但后来则步入正轨，且成绩斐然，很多钢铁厂在那时建立）

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加写一段话：“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同时，这个决议也提出：“人民公社在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分基金等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必来一次明文规定。一般说来，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济，零星果树暂时仍归私有。”

九月五日，最高国务会议，毛泽东讲话：今年大概可以差不多增产一倍（粮食），即有可能从去年3700亿斤，增到七千几百亿斤……这些都还是一些预计，还要看实际的结果……钢铁明年可能超过2000万吨。总而言之，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之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这就是群众的干劲的结果。

九月十日、十一日：刘少奇“狗肉汤”名场面

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即说：“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九月十九日—二十八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少奇同志说：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九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讲话，说：吃饭不要钱，干活更有劲，是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要那么多铺子干什么，小商小贩快快转业

九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小炉子这个时候花点钱不算浪费。

九月三十日，邓：不增产“100%以上”就“不是用革命的办法而是用改良的办法领导农业”，就是“思想还没有解放”。

九月，邓视察东北三省时称：“我国的农业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还没有翻身。”

十月二日，毛泽东同六国代表团谈话，说：那时我们辩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这个问题。我那时候怀疑这个口号，我说是不是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他们都不赞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图表给我证明。从那一次会上我才去掉这些怀疑，是否完全去掉了呢？还没有。之后，来了一个夏季丰收，我这个怀疑就减少了。到了八月我们开了北戴河会议，这个时候，今年的年成大体可以确定了，这次确定了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我的怀疑去掉了百分之九十九，还有百分之一的怀疑。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还没有到手。到今天我还要保留这百分之一。等秋收的结果最后证明了那我就信了。我刚才讲，今年农业增加产量大体上可以肯定，请你们注意大体这两个字。我还有百分之一的怀疑。

十月八日、九日，邓：“稻上飞”传世经典（又有“谷上蚤”、“稻田空气动力学”等民间戏称），把邓戏称为“稻”的出处，近年来网络“稻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手动滑稽）

邓、杨尚昆、林铁等人在当地官员陪同下，视察了天津专区霸县胜芳镇人民公社和天津市郊区新立村人民公社的丰产稻田，视察了天津市鸿顺里人民公社和天津大学。饱餐天津狗不理包子的邓等人来到胜芳镇人民公社的丰产稻田，和杨尚昆喜笑颜开地站在稻子上面合影留念。这块丰产稻田亩产高达11万斤，邓等六人站在稻穗之上如同站在石头上一样。这些稻子当然不是在同一块地里长出来的，而是用很低劣的欺骗手段，把别的地里的收获并到一块地里的结果，这是在大跃进时期放高产卫星的惯用手法。邓年谱中记载，1958年10月8、9两天确实视察了胜芳公社。（《邓年谱（1904—1974）》下，第14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但奇怪的是，《杨尚昆日记》缺了1957年11月到1958年11月6日这一段时间的记录。

在胜芳公社等处视察之后，邓1958年10月10日晚在石家庄听取了石家庄地委和专署负责人的汇报，在谈到农业生产时说：农业生产要采取不断革命的精神，要敢行敢做。要善于揭示自然秘密，揭示物质的秘密，只要人的思想解放了，就能更多地掌握科学技术，充分发挥挖掘物质的力量。（《邓年谱下》，第146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离开胜芳公社的高产稻田，邓等人又视察了著名的共产主义典型河北徐水县。



世界名画

十月十二日，刘少奇在接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时说：我们党在县以下的政权已经开始灭亡；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通过今年的大跃进，我们现在农村粮食已开始走到‘各取所需’了，凡能劳动的，都能吃饱，可以说是放开肚子吃吧！明年城市也可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再努力一下，主要是在主要生活资料方面做到‘各取所需’就可以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距离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遥远的了。

十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听取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徐水工作：“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对私人间的债务问题，一风吹，又一次‘共产’哩。这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把你的拿过来，这不是租借是侵略了。”他说：“要把劳动力多的农户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原则。”“不要发动那么多人去看徐水了。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把猪都并到那里，就不实事求是了。……苦战三年，才只搞了一年嘛，要搞百把年，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据称，“放开肚皮吃饭”这个口号的发明者是柯庆施。这个口号传出来以后，中央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谭震林在南京检查工作时，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建议在口号后面再加一句“鼓足干劲生产”。于是“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就成为了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名口号。“放开肚皮吃饭”虽然只在一九五八年十月份起被广泛实行了两三个月，但造成的后果却非常严重。）

十一月六日，毛泽东指出：1070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四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

十一月九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讲话：

要把根本的方针、界限、达到的目的、相互关系搞清楚，现在有些问题相当混乱。不仅在

公社方面，就是在中央、省、地这三级里头，都相当混乱。但是纲要在内部一公布，一传就都传出去了，主要是钢、机床、煤、电四项指标吓人。过去我们提的是十五年或者更短一点时间总产量赶上英国，现在提按人口平均赶上英国，是不是还加一个更多一点时间，到那个时候办不到怎么办？毛主席说：把时间延长一点，现在只赶英国就可以了。

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听王任重汇报时，对“万斤稻田”作出评价：“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掺假才能算数。”

十一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讲话：“记者头脑要冷静”，说老百姓瞒产“值得同情”，“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批评抢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强调“压缩空气”把高指标压下来，批评弄虚作假的浮夸风。会议把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钢产量指标由 2700 万吨至 3000 万吨调整到 1800 万吨。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说：北戴河会议有点急躁，就是那个少则三四年，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响。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那个时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彭真：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刘少奇：农民穷一点好转。）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刘：如果这个时候不搞，他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包了。彭：搞慢了不利。）照刘和彭两位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他不想过渡了。这个问题今天不讨论。

同日，毛泽东讲话，指出：去年冬季到今年秋季是搞了五百亿土石方，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比五百亿土石方要多差不多三倍。我看这样搞下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国五亿农民，十分之一就是五千万人。如果死了五千万人，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要撤掉，你们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职问题，我这个头也没有了。你（指曾希圣）是想搞多的，你搞多也可以，总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

同日，毛泽东同胡乔木谈话，指出：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十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谈一九五九年钢指标：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

十二月，谭震林和廖鲁言在给中央的《关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主要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报告》中说：“根据西安、广州、南京、呼和浩特四个分片农业会议的预计，一九五八年粮食总产量是八千五百亿斤。这是经过各省、市、自治区压缩后的数字，压缩的幅度一般是比地、县委报的数字少百分之十到三十。”中央于十二月七日批转了这个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十二月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中提出：全国粮食产量“1958年预计 7500 亿斤，1959年计划 10500 亿斤”。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把我们自己的报纸打开一看，净是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国务院在制订 1959 年农业生产计划时出现了重大失误，使 1959 年粮食播种面积比 1958 年减少了 9.1%，其中夏粮播种面积比 1958 年减少了 20%，即减少 1 亿 1000 万亩。以 1957 年中国粮食亩产量计算，这相当于 1959 年减产 339 亿斤粮食，相当于总产量的 10%。

（《农业部党组关于一九五九年农业生产的几点意见》（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中说“在农业工作会议期间，曾经向中央书记处做了汇报，得到了明确的指示。现在，根据会

议讨论的结果，提出以下几点，如获同意，请中央批转各地……一九五九年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十六亿亩，比一九五八年减少了二亿亩。”）一面是播种面积减少，一面是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1959年-1961年，全国出现上世纪五十年代最为严重的一场自然灾害，受灾面积4463万公顷，成灾人口8043万人，超1949—1958年平均数80%以上。）致使这年平均单产减少。这两个减少导致1959年的粮食总产量仅有34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500亿斤，跌到了1954年（3390亿斤）的水平。1958年度全国征购粮食1095亿斤，已经达到了农村承受能力的极限。然而1959年度统购粮的征购量却高达1348亿斤，比1958年多征购253亿斤，“征收了过头粮”。）

一九五九年及以后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九日，赵紫阳：广东瞒产私分粮食七千万斤。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瞒产私分造成的。二十二日，毛泽东批示：

赵同志给广东省委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信件及广东省委的批语，极为重要，现在转发你们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影响广大基层干部的共产主义品德，影响春耕和一九五九年大跃进的积极性，影响人民公社的巩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各地各县凡是对于这个问题尚未正确解决的，必须立即动手照赵同志在雷南县所采用的政策和方法，迅速予以解决。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肯定了公社在现阶段仍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这一点使群众放了心。但公社很大，各大队小队仍怕公社拿走队上的粮食，并且在秋收后已经瞒产私分了，故必须照雷南县那样宣布粮食和干部两条正确的政策，并举行一个坚决的教育运动，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政策和方法正确，解决问题的时间只需要十天或者半个月就够了。

二月二十七日—三月五日，毛泽东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重要论述有：“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同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就是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你越想搞就越搞不成，你越不想搞就越成。现在要慢一点搞，不要想十五年、二十年搞共产主义。”“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斛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瞒产私分，劳动力外逃，磨洋工，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推动了我。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六中全会决议就是缺三级管理、队为基础这一部分。这是个缺点，这个责任我担当起来。”会议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了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了一县一社的体制等等。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同吴芝圃谈话，指出：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的办法是没有理由的，是掠夺，是抢劫。三月二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

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指出：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苗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

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下名篇：第五篇《党内通信》，一共六条。“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达这种死硬的命令。”“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以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部实行。十年以内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部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逐年增加化学肥料，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之后，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回潮。一九六〇年末，“左”倾错误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得到纠正。

从一九六〇年年中到一九六五年年初，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多次作自我批评，至少有十次。

（包括但不限于：《十年总结》和讲解《十年总结》的讲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事实上，早在第二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在讲话中明确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作出了自我批评。后来，应其他与会者的要求，毛泽东在自己的讲话整理稿里删去了明确指出自己负有责任的话。）

综合结论：

工业：

毋庸讳言，工业战线上出现的浮夸风气，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的集体责任。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所有的高指标，都不是毛泽东率先头脑发热自己提出的，而是阅读各主管部门大量报告、听取大量汇报后，在一片信誓旦旦可以完成的声音中作出的决定，可以说完全符合一般的决策程序。

刘少奇在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轻易地把未确定下来的、未向下传达和对外宣传的赶超目标提前“传出去”，还添油加醋、擅自加码。毛泽东是在北戴河会议之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才公开两年超英的。（“通常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与会人员听取国家主席的报告或其他工作报告后，对这些报告和提交会议的政策草案进行充分讨论、研究，提出不同看法或修改意见，使这些报告得到补充、完善后在适当场合（如全国人大会议或政协会议）公开发表，使必要的政策意见调整、完善后经过一定程序正式颁布施行。”——百度百科）

问题显露出来之后，最先纠偏的是毛泽东。检讨次数最多、检讨最为诚恳的，也是毛泽东。所以，一线领导人和各部门负责人应该负主要的责任，毛泽东应该负一定的、居于次要地

位的失察、轻信之责任。

农业：

毛主席绝大多数时候是清醒的，期间也因为错误汇报和数据出现过判断和决策失误，也接受过一线领导人的“左”倾观点。但一线领导人、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对毛的欺瞒、封锁、阳奉阴违和对浮夸风、共产风、干部特殊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五风”的竭力鼓吹，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这一部分错误绝对占主导地位。而首先察觉并纠正这些错误的人就是毛泽东。**对于属于自己的那部分错误，**毛泽东在后来主动承担。**而一线领导人、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大刮歪风、积极鼓吹、推波助澜阳奉阴违、抵制纠错、事后不主动承认错误，还用七分人祸的说辞来混淆视听，用“三自一包”来妄图倒退。孰是孰非，可谓昭然。

总结：

大跃进时期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出现了错误，带来了严重后果，其主要责任应当归于一线领导人、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地方各级领导干部。毛泽东同志在一定时期内也因失察、轻信犯过错误，但正确地、及时地进行了纠正，后来也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自己的那部分责任甚至还承担了一部分其他人的责任。相反，一线领导人、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不但在运动时期大刮歪风，对毛主席搞封锁、欺瞒，阳奉阴违，而且也未见有主动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的言行，甚至还在事后用“七分人祸”混淆视听，妄图把自己的错误栽赃给主席。事实清楚，是非分明。某些人热衷于侮辱历史、抹黑领袖，令人不齿。

二零二零年十月一日初稿

二零二零年十月十日修订稿

全文二万一千字